

眾聲喧嘩——Why, What, and So What?

汪琪*

※【限於所學，本文僅回應鍾蔚文與夏春祥兩位教授有關「眾聲喧嘩」的討論】

「眾聲喧嘩」這個用語最初被提出來的時候，顯然有其特殊的指涉與意涵；M. M. Bakhtin 主要的目的並不在討論我們所泛指的傳播、也無關學術研究。不過如果我們把它借用過來，確實可以開展另一個討論空間。

事實上，在西方的傳統裡面，「眾聲」或「多元」從來都不是壞事；「眾聲喧嘩」就更不是壞事、或甚至是很好的事了。不因為別的；言說、論辯得多，表示多元思想、觀點彼此激盪的頻率與熱度升高，矛盾得以凸顯、錯誤得以修正、新看法得以形成、真理也愈得以彰顯。

只不過我們要把這個自希臘時代所發展出來的傳統移植到二十一世紀台灣的傳播研究，顯然不能不考慮到社會文化差異與典範移植所可能造成的影響，例如，造成「喧嘩」的原因是什麼？「喧嘩」的本質與意義為何？想要藉此達成任何目標嗎？——換句話說，「喧嘩」之後又怎樣？

不需細細思考，就可以知道昔日雅典與今日台灣之間的差異，可能遠比我們所想像的要大——如若不然，鍾蔚文與夏春祥兩位教授儘可直入喧嘩的內涵與意義，而不必把大部分的篇幅用在反省、與探討時下台灣傳播研究所遭遇、或可能遭遇的問題。

確實，應然面與實然面的差異是非常重要的，當鍾蔚文教授宣稱他在「眾聲喧嘩之中看到了學門的生機」，他所指的，實在不是台灣傳播學界

* 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教授。E-mail: telgw@cc.nctu.edu.tw

版的「眾聲喧嘩」。如果由鍾文的脈絡觀察，今天台灣傳播界之所以有喧嘩現象，是因為傳播研究在台灣已經逐漸發展成「每人頭上有一片天」、甚至「同行如隔山」的情況，以致於「雞同鴨講」，彼此之間無法溝通、只能喧嘩吵鬧⁽¹⁾；這種喧嘩與 Bakhtin 所指陳的，一種開放胸懷、相互尊重氛圍下的互動，是非常不同的。

討論至此，接下來一個我們無法逃避的問題，就是：「何以至此」？

顯然，這裡不會有一個標準答案。兩位教授文中提到的，有些屬於傳播學門發展過程所遭遇的問題，例如學門地位與次領域繁多；有些是教育訓練所產生的偏差或兩難，例如理論或實務孰重、以及形式主義的問題，還有些是國內傳播學界發展的特殊現象，例如與國際學術圈疏離、以及長期位居邊陲的困擾。這些問題當中，有許多有著上、下游的關係：上游問題沒有解決，下游自然也無解。

本文以下的討論，將嘗試把焦點放置在一個可能是屬於上上游的問題，也就是夏文「靈魂不安」、或鍾文所指，「喪失思考與想像的能力」。「思考」與「靈魂」顯然與「喧嘩」很有關連；如果沒有思考與靈魂，喧嘩、或任何形式的呈現都不具意義，本質上與噪音相去不遠，遑論互動、溝通。

傳播研究，無論是量化或質化傳統，都來自西方的思想——一個與我們很不相同的傳統。「人雖然很相像，但一群一群人可能注意的問題卻是不太一樣的。」勞思光先生⁽²⁾在談到大傳統的形成時，曾經有這樣的觀察：歐陸在希臘時代最關心的是「世界如何構成」的問題，因此所形成的傳統是智性的、目的在建立準確的知識。但也並不是所有的人群都想要追求確定的知識；印度人問怎樣可以脫離人生的種種痛苦，而儒家關心的是生活秩序的建立，注意力大多放置在道德、倫理的問題上。在這個脈絡之

下知識份子最重要的任務是熟讀聖賢書，並且身體力行，以之治國、平天下；西方定義下的思辨不重要，也不被鼓勵。

今天「西學」應該為體、還是為用的爭辯好像已經結束，然而華裔學者從事社會科學研究，仍然牽涉跨越文化傳統與治學典範的問題。在台灣，這意味著由大學以前的「讀聖賢書」傳統，突然間轉變到「思辨」模式。大學為入門時期，矛盾還不明顯；但是到了研究所階段，當許多研究生在面對「獨立研究」的挑戰時，發現最大的問題竟然是「沒有問題」。為什麼沒有問題？因為「西哲先賢」所言極是，無可挑剔——沒有資格、也不敢挑剔。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無論傳播學術活動或研究，都呈現一個「無我」的特色。國外學者來訪，無論學術地位如何，動輒封以「大師」桂冠，競相瞻仰風采，卻未感覺到無人可以與之對話的尷尬與危機。在畢業或出版的壓力下，治學常常不求甚解；一位學者曾經批評國內學界，「結構」還沒有弄清楚便高談「解構」，同樣的，「現代」未明便暢言「後現代」。結果多的是套用西方理論解釋本土現象、或以本土現象印證西方理論，萬一解釋不通印證不成，只證明台灣經驗與眾不同；怪不了別人。即使反西方霸權宰制，其所持的論點也無一不傳自西方而不自覺。表面上是「形式主義」、「訓練無能症」併發，事實上都還稱不上⁽³⁾；如果形式真正周全、訓練真正完備，怎可能錯失了研究的真正目的？

由於治學的態度是服膺權威、目的是熟讀名著、不重反省思辨，逐漸的學術研究開始有「宗教化」、「意識型態化」現象。任何人一旦認同於某一學術流派，便無可避免的掉入本質主義的陷阱；為了維護本身路線的正當性，對於「異己」言論、或任何可能動搖地位的議題，必然反感。自古以來，最慘烈的戰爭都是代理人的戰爭；學術亦不例外。只是在一個小小不過百餘人的社群，無論評鑑、審查，彼此相互依存，又何苦如此？結

果所謂理性論辯，公開場合最多也只停留在殘缺的「形式」上；私下，則相互拒斥、甚至齟齬的不在少數。昔日殷海光病故，與他長年筆戰的徐復觀痛心失去一個「可敬的對手」；如今傳播學界中人最缺乏的，可能不是「伯樂」，而是「可敬的對手」。如果沒有「可敬的對手」，如何喧嘩？喧嘩何用？

在所有問題的討論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曾在香港任教的大陸留美學者潘忠黨對於台灣傳播研究沒有靈魂（見夏文）的觀察。他的批評值得注意，因為夏文中有關傳播研究的許多問題，例如傳播的應用性質、學術社群規模的限制、「本土化、國際化」的挑戰，甚至跨越文化傳統與典範的問題，無一不存在於台灣之外的華人傳播學術社群，難道只有台灣的傳播研究沒有靈魂——而由國內學者的檢討來看，我們竟然也頗能同意？

這個現象顯示除了文化面，可能還不得不由社會層面尋找問題的答案；多年來台灣主背誦、僵化的教育方式將傳統徹底「包袱化」、一般學生求知不事思考。近年許多人大聲疾呼打破研究框架，例如陳世敏主張將研究素材拓展到如同《叫魂》的領域⁽⁴⁾；還有更多人主張非西方化或本土化，包括我在內。然而這些主張都不過是提醒大家研究素材其實很豐富、視野其實可以很廣闊。但這些——包括本土化在內，都不是目的，而是啓動思辨機制、達成理論化的助力。

當然，以上所言絕不在全盤否定台灣傳播研究的價值、或主張所有非台灣的都比較優越，而是說我們已經走到這裡，為什麼不能更進一步？辯證思考主顛覆—超越。顛覆、論辯、喧嘩都為超越。即使中國的學徒也有出師的一天。或許這是我們好好思索喧嘩真正意涵的時候了。

註釋

- (1) 鍾文第一頁：「傳播學者之間溝通漸如同雞同鴨講，傳播研究進入了巴伯塔的世紀。慢慢地，與異領域對話容易，不再有隔行如隔山的生疏，反而是『同行卻隔山』成了常態。」
- (2) 勞思光先生有關佛教哲學基本問題的談話。
- (3) 以量的研究法而言，形式上需要有研究背景、文獻探討、研究問題、方法、結果分析與結論等部分。但是許許多多研究的文獻探討沒有文獻評析、不發展理論脈絡、只有理論拼裝；最後不回歸理論作討論、沒有結論、只有發現；許多甚至沒有研究問題。
- (4) 陳世敏，傳播學術與新發展，國立政治大學，二〇〇二年五月十八日。



智慧藏